

以和为贵 和合善治

——中国古代和平理念与实践

□ 田嵩燕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和谐、和平、和合，以和为贵、和合善治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和合”，既是中华文化对于宇宙万物基本秩序的理解，也是中国人用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等各个层次人我关系的人伦法则。将这一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治理，便体现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统一观念和文治精神，以及在处理外部关系时的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思想。

“和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辩证法和人伦法则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之本源为“太极”，“太极生两仪”而有天地阴阳之别。阴阳是构成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宇宙万物无时不处于阴阳相交、刚柔相推的变动流转之中。宇宙万物通过阴阳调和、协调发展而达到的“和合”境界，就是自然界和人本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合”是融合、联合、合作，“和合”是和谐基础上的合作，“和合共生”就是宇宙万物和谐统一、共生共赢的完美秩序。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概括的正是宇宙和自然法则中的和合之道。这就是中国人对宇宙万物基本秩序的理解，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当然，“和”并不是单一、静止、无差异、无竞争。中国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因为有了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通过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产生新的成果；如果只有同类聚合，排斥异己，那么就会丧失活力，窒息生机。所以，“和”不是完全相同、毫无二致，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通过良性竞争和协调发展而达成的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北宋初年大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对立性，所以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斗争的双方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对立统一性的认识，就是中国人的辩证法。

证法。中国古人主张，人类要依循自然规律行事，要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契合，所以“和合”这样的自然法则，也是中国人用以处理人我关系的人伦法则。《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在强调“和”作为人类社会至高法则的地位。依循“和”的法则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追求“天人合一”；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就要强调“和衷共济、以和为贵”。当然，人我关系的和谐统一也是建立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孔子说“和而不同”，“不同”是“和”的基础，“和”的精神恰体现于“不同”的存在。人类社会既追求和谐相处，也强调求同存异，只有在“同”与“异”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和良性张力，才能获得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生机与活力。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就是中国人的人伦法则。

中国传统政治的统一观念和文治精神

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和合”理念首先体现为中国人对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的追求。战国时代的各派政治思想家们虽然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百家争鸣，但他们都赞成单一君主治理的方向。后世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为最高政治追求。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凡是国家统一之时，也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康之时；而国家分裂之时，也往往是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之时。因此，不仅仅是历代统治者追求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普通民众也树立了“统一是国家之福，分裂是国家之祸”的坚定信念。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新王朝的出现一般是战争的结果。新的王朝依靠武力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但要想有效治理广土众民的国家，就必须转向文治。所谓文治，就是文明之

治、文德之治。文治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道德、伦理、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更化善治”，其用意就在于：建立一套与国家需要相适应的道德文化秩序，以此作为实现“善治”的根本。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德治思想、君臣伦理观念为汉代的中央集权政治架构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强有力支撑，由此开启了长治久安的一代盛世。汉代之后，中原王朝屡经兴替，但历代统治者始终尊奉儒学为正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安顿人心、凝聚共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上下和合，世俗盛美”的善治理想。

文治精神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一套选贤与能的选任制度。“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中国人自先秦时代就树立的政治理想，其中蕴含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把社会中最优秀的一批人选拔出来，输送到治国理政的岗位上，从而保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选任制度一向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从汉代推举“贤良”和“孝廉”的“乡举里选”制度，到汉末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具体的制度设计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但是贯穿其中的文治精神始终未变。一代又一代通过选任制度进入仕途的治国理政者都是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和合善治”理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底色。

处理外部关系时的协和万邦思想

《淮南子》中记载了一个大禹如何宾服天下的故事：“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典故的由来。化干戈为玉帛，止兵戎致和平，

在中国人看来是治国理政者妥善处理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庄王的一个观点：“止戈为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武”字是由“止”和“戈”两字合成的，停止使用武器，制止暴力，才是“武”的精神之所在。这两则故事说明，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深深印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

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秉持“以和为贵”“以德服人”的原则。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政治原则。其后在战国时代，孟子进一步讨论了“王霸”之别：施行仁政以德服人为王道；凭借武力以力服人为霸道。孟子明确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王道思想代表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内表现为仁政爱民德化天下，对外则表现为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奉儒家王道思想为正统，强调“内修文德”为先，“外治武备”为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往往追求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尽量不开启战争。即便不得不开启战争，也强调“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追求以最小代价结束战争。三国时期著名的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便是实践“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理想的经典事例。

“以和为贵”“以德服人”的政治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逐渐演化成为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合，所以强调待邻国如待邻里，彼此要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所谓“亲仁善邻”。将家族和睦、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推广到万国万邦，实现四海一家、世界和平，是所谓“协和万邦”。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法则和最高理想，也是今天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石。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上次谈到了古今问题，而如何对待自己与外部世界，又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外问题关乎国本

以汉族为多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贯穿的是中国内部以华夏族或汉族为中心的同质互动，以及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与外域的民族互动。这漫长的互动期，中国内外各民族为生存与发展，兵戈相向，声讨征伐，遣使质子，商贸往来，朝贡纳聘，互通有无。既碰撞冲突，又友好合作，共商共享共赢。在这个过程中，种族得以交融，且在各民族共同创造并积淀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和基础上，诞生出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最终形成。

中国的文明，就它的本质而言，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的文明，其表象可分为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三类。围绕这个根基及其表象，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很早就开始了。随着华夏族与异域不断征战融合，中国先民逐渐形成以文化来区分内外的



认同标准，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秦汉至唐宋，中国人的天下观涵盖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包含更多不同文明。在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关系的问题上，秦没有处理好统一之后遗留下的与六国关系问题，成为亡国之重要原因。汉朝从休战和亲到反攻，建西域都护府，最终形成丝绸之路。隋唐都曾征朝鲜，与突厥发生冲突，也以礼服外邦。唐时，迎来万国来朝局面。到国土跨越亚非欧的元代，中外之间，伴随武力解决中外问题，也带来了贸易繁荣与宗教宽容。并且由于元享国时间不长，中西互动看似繁荣，但未得深入展开，在互动人群、区域以及数量上也颇有局限。明建国后，中外问题，除了朝贡外，也是对未臣服者施以武力。明末以来，中外开始直接大规模正面互动，到18世纪跌至低潮。

以上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统治

中外问题

——中国古典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下）

□ 陈晓华

区被汉族人视为天下中心，汉族之外的世界是被作为“夷”来认识的，因此如何把握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争论焦点在夷夏之防上。以夏制夷，避免夷化。故而，中外问题，虽然一直以来都存在，但在明中叶以前，边境安危是最大的中外问题，所谓夷夏问题多是中国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观念问题。至明中叶以后，中外之间在思想文化上才真正交锋。

进入近代，中西互动为有识者倍加关注，他们希冀从中获得强国富民的养分。但如何借鉴，虽然还残存些微夷夏之防的影子，但因为意在救国图强，引发的是一场深刻的中西之争，中西何去何从之争至今犹存。到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外互动无处不在。各国为争取世界话语权，也从各自文明入手，着力本土文明建设。当今世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科技之争，抛开现象看本质，实际就是各文明之

争。因此，中外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对于中国的世界性地位至关重要，这也是关系我国本的大问题，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文史工作者刻不容缓必须担当的重任。

注重互动中的中外文明比较

当然，有关中外文明的研究，古今中外不乏研究者，但往往不自觉地会为研究者所处的国度、成长背景，文化滋养以及喜好所局限，难免会生出中心主义，关注大范围时段时就远远不够，而以全球化视野，着眼于互动，从互动中见异同，恰可避免这等弊端。有关中外文明研究，可着重以下方面。

一是比较，这个比较是文明框架下各属性的比较，思想层面、制度层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地区的疫情控制住了，才能从根本上尽快扭转全国疫情蔓延局面；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实施地毯式排查，采取更加严格、更有针对性、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要完善防控措施，加强重点群体管控，减少行走的传染源，减少人群流动和密切接触，坚决控制疫情发展，等等。从实际情况看，坚持底线思维不仅确保了前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而且也必将为在后续工作中把“毫不放松”的要求落到实处提供强有力保证。

强化法治思维，切实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

这次疫情的暴发无疑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不论是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安全建设方面的滞后和隐患，还是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尤其是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储备上的不足，包括在自媒体高度发达时代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显示出我们在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上还存在短板死角，现有的相关法治规范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从各个层面完全有序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结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和教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在于，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以确保在特殊事件、特殊时期中能够有效有序有度地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

疫情发生以来，针对严峻复杂的防控形势和一些群众存在的焦虑、恐惧心理，党中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要多层次、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着力稳定公众情绪。这一系列重要要求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融入了更多暖色调，营造了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也为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员干部

部的法治思维赋予了沉甸甸的任务。

强化辩证思维，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按照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明显影响，而疫情发展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更是使党中央不得不把防控疫情提到了当前“头等大事”的战略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基本趋势，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广大党员干部战“疫”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对这些现实问题和潜在影响，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坚定信心，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为此，必须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十三五”规划。这一系列重大判断和工作指示，理清了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展现了我们党在疫情应对上的辩证思维，也对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辩证思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关系提供了及时的科学导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任务对广大党员干部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上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须结合具体的工作任务予以具体把握和运用的思维指导。因此，在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目前这样一个防控疫情的关键节点上，广大党员干部需要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形势和具体特点，进一步强化科学思维意识，提升科学思维能力，从而切实把“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要求落到实处。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三是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如作为中国文明根基的儒家文明的海外传播就是典型例子。儒家文明就自身发展而言，经历了六个重要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儒家文明奠定了基石。当然，这只能算是儒家文明的开端，还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文明。要由儒家而至儒家文明，还需要漫长的征程。汉代和唐代是这个征程中两次重要的里程碑。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足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吸纳各家合儒补儒，并加以实践，成为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域各民族共同认可的汉文化标识，最终形成了儒家文明。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倡导儒学革新，为儒家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中外互动有加，佛教于东汉初年进入中国，融入了中华文化，唐时更有各国人员往来朝奉留居等，儒家文明得以向域外传播，尤其是向周边的朝鲜、日本辐射，儒家文明开始扩张。这也是儒家文明自形成之日起，就与身具有的开拓意识决定的。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儒家文明形成，同时也传播到周边国家。以民国时期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这是近代以来吸纳欧风美雨后的新儒家，探讨的是中西古今以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其中古今问题倒是有一定结论，但中西问题，以及中国何去何从问题，那个时候无法解决。由上可见，儒家文明形成至今，儒家文化的边界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